



胡適研究禪宗史的努力與貢獻

智銘

(續上期)

但是，我們的圭峯大師宗密和尚是西川果州人，他是最熟悉成都府的淨衆寺和保唐寺兩大宗派的思想與歷史的。我們竟可以說，在敦煌寫本『歷代法寶記』出現之前，日本的禪宗史學家與中國的禪宗史學家，都只倚賴宗密的圓覺經大疏鈔卷三之下記述的禪宗『七家』，作為禪宗最重要的史料——特別是關於成都淨衆寺與保唐寺兩個宗派的唯一僅存的史料。……

『益州金』就是淨衆寺的金和尚無相。『益州石』就是『當寺石』——就是淨衆寺的石和尚神會。可是宗密總不稱他的法名神會，只叫他做『益州石』或『當寺石』。

我們現在至少把成都府淨衆寺神會和尚的傳法世系弄清楚了，這個世系是這樣：

弘忍——智詵——處寂——無相——神會——南卯
(淨衆寺)

這一系與東京荷澤寺神會和尚的傳法世系原來是不相干的：
弘忍——慧能——神會——磁州法如
(荷澤寺)

黃龍山唯忠。

這兩個神會和尚的兩支不相干的傳法世系，怎麼會混合作一支去了呢？是誰開始造出『唯忠亦號南卯』的『人身錯認』的假世系呢？（『胡適禪學案』三九五—四一九頁）。

關於宗密是或不是荷澤神會四傳弟子的問題，已將羅、錢、胡三位先生的原文摘錄如上，他們對古人的書所持的態度顯然不同；羅、錢二先生相信宗密自己說是神會（荷澤寺）的四傳弟子。而胡先生經過詳細的考證後，認為宗密是成都淨衆寺神會的三傳弟子，是宗密「拋棄自己祖宗」而「攀龍附鳳」要變更自己的身份。難怪「宗密思想顯然和南方禪宗血脉相異，路頭不同。」（錢穆先生語）。也難怪「宗密著述，從未提起神會撰壇事。」（羅香林先生語）。

乙、六祖壇經的作者問題

羅先生在「壇經之筆受者問題」一文中說：

「胡先生於……『定慧等』、『坐禪』、『闢當時的禪學』、『論金剛經』及『無念』等五例，以實其論。其說誠為一時創見，然吾細考敦煌新出現唐寫本『南宗頓教最上乘摩訶般若波羅密經六祖慧能大師於韶州大梵寺施法檀經一卷』卷端，明署『兼受無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記』，而開卷二三行，即言法海與六祖關係，文云：『慧能大師於大梵寺講堂中，昇高座，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受無相戒。其時坐下僧尼首俗一萬餘人。韶州刺史韋據及諸官僚三十餘人，儒士三十餘人，同請大師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刺史遂令門人僧法海集記，流行後代，與學道者承此宗旨……』」

是敦煌新發現舊寫本大梵寺施法壇經，固法海所記集也。」（六祖壇經研究論集二七〇—二七一頁）。

錢先生在「神會與壇經」一文內說：

「古本壇經開首即有『兼受無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記』一行十三字，臨末又云：

『此壇經法海上座集，上座無常，付同學道際，道際無常付門人悟真。悟真在嶺南曹溪山法興寺，見今傳授此法。』

我們據此明文，何妨說此條懸記乃由道際悟真之流所爲，豈不同樣明顯？……壇經記慧能臨滅稱讚神會，安知非確有其事，若說此即神會僞造顯證，不免太輕視了神會，抑且又輕視了慧能與法海。似乎慧能決不能先見神會之特出，而法海也決不肯記載他的老和尚欣賞同門，以此衡古德，似太無情。」（六祖壇經研究論集八三頁）。

關於「六祖壇經」的作者是誰的問題，胡先生在「荷澤大師神會傳」內，確主張是神會或神會一派所作。但是在「胡適手稿」卷三頁五五三，討論祖師傳法偈誦時，有這麼一段話：

「我又試取敦煌出土的『六祖慧能大師於韶州大梵寺施法壇經一卷』來比勘，這是世間最古本壇經，但這個『最古本』，已可以看出其中有原始部份，有第一次加添的部份，還有第二三次陸續增加的部份。我試用鈴木貞太郎的分節本『敦煌壇經』作底本，其（一）節至（三七）節，大概是原始的部份，（三八）節以下，大概都是一加、再加、三加的部份了。在那原始的部份（九）、（十）兩節，叙五祖三更付法與衣給惠能，直到『辭違已了，便發向南。』這裏並無傳法偈語。」

胡先生又在「新校定的敦煌寫本神會和尚遺著兩種」內說：「我在三十年前，曾指出『後世所奉爲禪宗唯一經典的『六祖壇經』便是神會的傑作。我說：『我信壇經的主要部份是神會所作。』因爲『壇經中有許多部份和新發現的神會語錄完全相同。』……」

我現在不想重新討論這個壇經作者是不是神會的問題，我只想指出這篇壇語的出現，應該可以引起我們研究這個問題的一點新興趣。」（「胡適禪學案」二六七—二六八頁）。

關於「壇經」的作者是誰的問題，羅、錢二位先生持相同的態度，主張「壇經」的作者就是原記載的集記人法海。與胡先生過去的主張相異。但依胡先生手稿內的那段摘記看，他已「比勘」出「最古本」的「壇經」已有「原始部份」，還有「第一、第二、第三次加添的部份」，不過他沒有指明那「原始部份」的作者就是法海抑爲神會。其實，誰也無法確定「壇經」原始部份的作者究竟是誰，即就敦煌本本身來說，也自相矛盾。卷首與卷末確記「壇經」是由法海集。但（四七）節却又說：

「大師言：『十弟子！已後傳法，遞相教授一卷壇經，不失本宗，不稟授壇經，非我宗旨，如今得了，遞代流行，得遇壇經者，如見吾親授。』拾僧得授已，**寔爲壇經**，遞代流行，得者必當見性。」

這裏明明寫着「拾僧得授已，寫爲壇經。」分明說「壇經」是「十僧」的共同創作了。「壇經」本身即有矛盾，所以過份的爭論，將不會有正確的結論。「壇經」是本身多災多難的書，好像「見者有份」，任何人高興都可以將它加一點，刪一點，你分幾章我分幾節。像這樣一部雜湊而成的書，經過一千多年，能確定原作者是誰嗎？所幸的是；「壇經」每被添糅一次，沒有闖入邪魔外道思想，相反地每添糅一次，使它的文字更美、思想更圓融，所以它能經過一千多年，始終被視爲「禪宗」的唯一經典。

一本僅僅一萬四千字的書，經胡先生考證出其中的懸記與歷史發展的事實和神會的所行相合。又壇經的思想與神會語錄相合，甚至連許多的文字也相同，而壇經中的許多部份是神會或神會一派所添糅，也是大家所公認，在這樣多的相同條件下，三十多年前的胡先生，難怪他要主張「壇經」的作者是神會或神會一派了。三十年後他在手稿內和「新校定的敦煌寫本神會和尚遺著」的後記內，態度似沒有過去的堅持、肯定，但也沒有放棄他的主張，只是由於新材料——神會壇語的出現，「可以引起我們研究

這個問題的一點新興趣。」如果今後能夠發現更多的新史料，尤其是胡先生所耿耿於懷的日本大寺廟的經藏，經「大索」以後能找到如胡先生所希望的史料。那末，對這個問題的研究當更有助益了。

丙、「竟成壇經傳宗」的解釋問題

在教內的大德來說，對胡先生的考證持不同態度的人不少，但正式筆之成書公開批判的，只有印順法師一人。他在「神會與壇經」（與錢穆先生第一篇論文題目相同，觀點也有些相同）內說：

「前年（註：民國五十八年）中央日報中副欄，曾有壇經是否六祖所說的討論……我認爲這是個大問題，值得好好的研究一下，當時我沒有參加討論……這一問題的解決，不能將問題孤立起來，要將有關神會的作品與『壇經』敦煌本，從禪宗發展的歷史中去認識、考證。神會是曹溪慧能的弟子，慧能是東山弘忍的門下，所以我擴大了視野：一方面，從東山門下——北宗、淨衆宗、宣什宗的禪風去觀察『壇經』與神會。從南宗、北宗、宣什宗、淨衆宗——東山門下，探求到東山弘忍、雙峯道信的禪風，再進一步的研究到達摩。一方面，從『壇經』來看曹溪門下——荷澤宗、保唐宗、洪州宗、石頭宗的禪風。因爲注意石頭，也就引起了牛頭宗的研究，這樣的觀察一番，得到從達摩到曹溪的發展，以及禪入南方而引起的蛻變情況。一年來的研究，寫成一部『中國禪宗史』，對我來說，這是意外的，我從來不曾想要這樣做的，因爲我不是達摩、曹溪兒孫，也素無揣摩公案、空談禪理的興趣，而我竟那樣做了，只能說是因緣不可思議。」（海潮音月刊五二卷二月號）。

由這段開頭語，知道印公研究「神會與壇經」的大問題，是與錢先生主張「思想傳統」的研究路線一致，胡先生研究三十多年，尚未完成禪宗史，印公僅研究一年，就寫成一部「中國禪宗史」

。由參與研究禪宗史的諸位算來最大的收穫者是印公，而印公的收穫並不是「因緣不可思議」，而是胡先生研究這教內從不懷疑也更無人研究的「大問題」所帶來的善緣，這也應算是胡先生的貢獻之一吧！

討論到「竟成壇經傳宗」的這個問題時，印公說：

「韋處厚（死於八二八）爲道一（俗稱馬祖）門下大義禪師（死於八一八）作『興復寺大義禪師碑銘』（全唐文七一五）說：

『洛者曰會，得總持之印，獨耀瑩珠。習徒迷真，橘枳變體，竟成壇經傳宗，優劣詳矣。』

這幾句話，胡適論斷爲（神會集七六）：

「韋處厚明說壇經是神會門下的習徒所作（傳宗不知是否辨——註：胡先生原文寫的是「顯」字——宗記），可見此書出於神會一派，是當時大家知道的事實。」

韋處厚所說的『壇經傳宗』，確實說明了敦煌本『壇經』與神會門下的關係。但到底什麼是『竟成壇經傳宗』？沒有明確的理解，論斷就難免錯誤，不幸的是，胡適從來就沒有弄明白這句話的意思。原文在『壇經』及『傳宗』旁邊，加上符號，這是以傳宗爲書名的，所以小注說：「傳宗不知是否辨（胡先生原書是「顯」字，宗記），但出版後，他將『傳宗不知是否顯宗記』九字塗抹了，另在原書八頁眉批說：

『祖宗傳記，似即是韋處厚說的壇經傳宗之傳宗。亦即是獨孤沛所說的師資血脉傳。適之』

這樣，『傳宗』不是『顯宗記』而有點像『祖宗傳記』了。後來，他又改變了主意，用紅筆將原書（七五）『傳宗』旁邊的符號劃掉了。這樣，『傳宗』不是一部書名，那又是什麼呢？『竟成壇經傳宗』，一直沒有確切的了解，謎一般的東猜西猜，根本沒有弄明白這句話的意思，怎麼就說：『此書出於神會一派，是當時大家知道的事實』呢？……

（未完待續）